

# 新时代西部高等教育的

## 机遇、挑战与出路

■王顶明



王顶明

今年是世纪之交,在国家层面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第20年,也是教育系统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2—2020)即将收官的关键之年,还是国家高位部署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重要年份。站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需要系统回顾近百年来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客观分析当前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要求,深入思考西部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晚清以来,现代高等教育在京津沪等地相继萌芽,并在东南沿海诸省份快速发展。据第一次教育统计,1931年全国共有103所高校,其中上海22所、北京15所、江苏、广东、河北各8所、陕西、贵州、青海、宁夏、西藏、内蒙古等西部省份均无一所大学,60%的在校大学生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高等教育分布的“胡焕庸线”在这一时期自然形成,尽管当时的中央政府对此已有认识并试图进行调整,但收效不大。抗战期间,随着沿海高校的大量内迁,高等教育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四川、陕西、甘肃、云南等地高校数剧增。西北师范大学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烽火岁月西迁兰州时落地生根,结出的硕果,由此开启了西北高等师范教育的先声。尽管部分西迁高校在战后纷纷回迁复校,但已然为广袤的西部播下了高等教育的火种,为国家和西部地区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高等教育的战略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1950年及时召开,会议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改变高校过于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沿海地区的状况,院系调整成为推进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合理化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国家从战略高度重视教育的优先发展、体系建设和区域布局,西部高等教育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例如,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内蒙古大学、宁夏大学就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调整、组建、创办的,著名教育家李承德、南国农等一批专家学者,也是在这一时期响应国家召唤,从海外归来投身新中国建设,并由教育部直接安排到西北师范大学任教以支援西部建设的。据统计,1957年全国共有229所高校,其中四川21所、湖北18所、陕西11所、新疆5所、甘肃和内蒙各4所,而上海、广东、福建等地高校明显减少。“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高等教育发展差距,遏制了东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不平衡的趋势。

放眼世界,我们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科学技术变革等宏观环境的新变化、新趋势,给新时代西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新机遇、新挑战。

首先,“公平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给西部高等教育补偿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

植、优先发展。特别是“211工程”“985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双一流”建设等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这种“集中资源、率先突破、带动整体”的重点建设方针,体现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有力促进了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提升,一批高校成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支柱力量。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领域的“胡焕庸线”进一步凸显,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定位,以优先发展、集中优势力量重点建设的策略,推动高等教育机构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人才,一批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得以倾力扶

行业特色型大学之所以能够跻身高校“国家队”的行列,正是因为国家振兴行业的需要和学校自身的特色。因此,保持特色永远是行业特色型大学的立校、强校之本,是行业特色型大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特色会被赋予新的内容。

教育部随后出台东西部高校对口支援计划、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举措,逐步提升西部高等教育质量和实力,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高等教育发展差距,遏制了东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不平衡的趋势。

其次,“公平中国”战略的深入实施,给西部高等教育补偿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

更加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庄严承诺。西部地区的发展事关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则事关中国高等教育实力的整体提升、事关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跃升。尤其是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以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高等教育将发展成为新时代的基础教育。需要站在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高度,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给西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赋能、

赋权。以西安—成都—兰州为核心支撑城市的西北三角高等教育集群,和以西安—成都—重庆为核心支撑城市的西南三角高等教育集群,是面向丝绸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展跨境高等教育的前沿阵地,具有和沿线国家开展教育合作和国别研究、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立足地方、面向西部,系统谋划育人、资助、启民工作,就是西部高等教育贯彻落实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精神的生动实践。

第三,“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扬彰显给西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指明了方向。当下高等教育所强调的回归教育常识、回归育人本分、回归办学初心、回归梦想追求,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所始终坚守的初心与使命。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例,2008年以来,学校响应国家支援新疆建设的号召,持续12年组织了4000多名学生以实习、支教方式,持续为新疆地区基础教育服务,其中近半数学生毕业后再赴新疆工作。潜心育德树人、服务地方需求、突出社会贡献的办学坚守是西部高等教育的底色,也是西部高等教育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

第四,“大智移云”时代的科技变革给西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手段。随着新科技时代的奔腾而至,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新时代。随着学习环境智能化、人智教师协同化、动态学习常态化、素质评价精准化的深入推进,新时代的西部高等教育有了后发先至、弯道超车、跨越发展、变中求新的可能与机会。

总的来说,西部高等教育历经近百年的办学积累与探索,历经近百年的风雨洗礼与培植,在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新要求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

第一,牢固树立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理念和信心。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高位推动东部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协作机制、优质资源与特色资源衔接机制,从国家层面支持西部地区搭建大教育平台、大科研平台、大服务平台,不断增强西部高等教育的自我造血功能。

第二,“引育并举”建设西部地区高校人才队伍。充分借鉴历史上国家重点支持西部建设、支持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和积极做法,主动引导部分高层次人才到西部地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同时注重提升西部高校自身的人才培养能力,支持西部高校自主培养适应性好、稳定性好、贡献度大的高层次人才。

第三,科学评价西部高等教育的贡献与作用。及时破除不科学的评价导向,以创新的、分类的、多维的评价方式,突出强调和大力宣扬西部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与独特作用,引导和支持西部高校沉潜办学、精心育人、无问西东。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高校“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打造“万门左右国家级和万门左右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双万门一流本科课程由谁来负责具体建设?当然是各个学校的领导、院系主任和教授专家。但笔者存疑的是,他们能用多少时间来考虑本科课程建设?能否把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看成学校和院系的头等大事,全心全意投入?

要知道,学科是学术知识的分类,如化学、医学、历史等。但在中国,学科就是资源,一门学科只有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上,才能招生并授予学位,才能设硕士点、博士点,才能有教师的硕导、博导荣誉。而课程不过是学科专业的教学内容分类,如英语精读、翻译概论和语言学导论就是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下的专业课程,教得再好和职称晋升也无关。

因此,在笔者看来,课程建设似乎并不是院系领导们主要考虑的,更不是教授们考虑的。前者的主要精力似乎放在学科建设上,如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迎接学科评估检查;后者的主要精力则放在申请科研项目上发表文章上,这是职称晋升的“硬通货”。

重学科发展,轻课程建设,与我国高校考核评估体系有关。学校的发展取决于学科点有无、申报和排名,而评估的硬指标就是看学科点上获得多少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了多少核心期刊论文和专著、举办了多少重要国内外学科关联的会议、引进了多少学科专家等,而不是课程建设。

因此,把这些指标与教师的各种职称和荣誉(包括年度考核)挂钩就不奇怪了。同样,核心期刊栏目和国家项目指南与学科关联也不奇怪,其中大多数是学科理论研究的(如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或是国家关切的话题(如对外传播研究、“一带一路”沿线语言文化研究等,很少有关于外语教学的研究)。

现实中,课程教学往往是教师的自发努力,如教学方法的创新、教育技术的改进、教学能力的提高等,但这都不算是课程建设。按照教育部对一流课程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定义,课程建设的关键是课程定位和课程内容。

2018年,教育部颁发《新时代高教40条》,提出培养国家急需的具有国际交流能力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的创新人才,为达到这个目的,高校要主动“从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交叉融合”。2019年,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为“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高校要“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国家要求高校进行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以适应创新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就是各类课程的重新定位、课程内容的重新设计和课程设置的重新布局。

但实施情况却不乐观。一年来,面对英语和翻译专业课程的危机,笔者提出要从单一技能训练的课程分别向语言+知识(尤其是理工医农知识)和语言服务课程方向转移的建议。尽管引来学界的全国大讨论,但大都停留在“嘴仗”层面。

学科是知识的运用,与社会需求不直接相关;课程是知识的运用,必须满足社会需求。但外语界往往把两者混淆起来,认为英语专业没有必要满足社会需求。他们认为本科是培养人的,研究生阶段才是培养人才的。因此,“自由无用”被英语专业界人士广泛推崇,他们认为本科主要任务是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有的引用英国哲学家“大学目标不在于培养出技艺娴熟的律师、医生或工程师,而在于造就能力强、文化素养高的人”,有的引用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教育”和“大学生获得了某种专门的技能,这是耶鲁教育的失败”。

且不论这些引用是否恰当,实际情况是,美国和英国高校的本科教育都在实实在在地培养专业人才,以满足社会需求。长期在美国工作的教学大师丘成桐曾说,“有人说中国的本科教育不比美国差。但是在实践中我发现,美国本科教育比中国好得多,研究生教育比中国好得多”。

一流课程建设已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学科建设是以领导为中心的,课程建设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前者考核领导的业绩,后者检查学生的能力;前者是任期内的荣耀,后者是几代人的质量;前者是大厦,后者是基础。只有把重心从学科建设转移到课程建设,中国高等教育才有希望。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 本科教育的希望在于课程建设而非学科建设

■蔡基刚

# “清华学堂”拔尖人才培养的经验与启示

■孙祺

探索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也是当前对高等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2009年,清华大学推出了“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学堂计划”),并于次年批准列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经过十年的发展与探索,形成了以“姚钱数”(计算机姚班、钱学森力学班、数学物理基础科学班)为代表的特色培养模式,其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 人才培养目标与育人理念

“学堂计划”致力于构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特区,激励最优秀的学生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努力使获计划支持的学生成长为相关基础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并逐步跻身国际一流科学家队伍。同时促进学校开展教育体制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

“学堂计划”坚持“领跑者”理念,积极营造清华学堂环境,实施优势转化战略,培养基础科学未来“领跑者”。在选拔“领跑者”时,即选拔优秀本科生作为“领跑者”,带动整体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的同时,培养基础科学未来“领跑者”,通过实施优势转化战略,将学科、师资、国际交流、优质生源、优良传统等方面的办学优势积极、主动、优先地转化为人才培养质量的优势,培养基础科学未来“领跑者”。

##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实行首席教授负责制,依靠拔尖培养拔尖。“学堂计划”聘请各学术领域的国际顶级大师、一流学者担任首席教授和项目负责人,首席教授全面负责学生培养和项目管理工作,亲自设计人才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并亲自参与课程教学等工作。

以“计算机姚班”为例,项目邀请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得主姚期智院士根据自身多年执教经验,亲自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姚班所有专业核心课程均采用全英文授课,促使学生适应国际化教学模式和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思维方式,姚班还搭建国际交流平台,使所有参加项目的学生都能参与海外著名高校交流学习。

其次,以科学精神培育为引领,夯实核心学术素养。“学堂计划”注重以学生的核心学术能力为学业发展的基石,以求索奋进的科学精神为学术生涯的引领。大部分项目均在学生第一年开设了关于学术精神和科学史、科学方法论、人文基础素养等方面的课程,培养学生对科学、人文、艺术及工程之间跨学科关联性的理解,激发学生责任感、使命感和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宏伟志向,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学术素养和发展潜质。

第三,以挑战性课程为抓手,激发学生学术潜力。“学堂计划”鼓励学生在科学挑战中学习科学知识,掌握创新方法,让学生直面学术研究前沿开展探索。各个项目均在课程设置中加入了大量挑战性课程,教学内容选择上加入了很多专业领域的热点问题,鼓励和引导学生在本科生阶段就尝试冲击学术前沿阵地。

以“钱学森力学班”为例,项目设计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研究实践、人文等综合贯通的挑战性课程体系。把挑战性学习贯通整个本科教育过程,大一、大二进行基础学术训练,大三开展创新挑战项目,设置“土木工程结构破坏试验与模拟”“机器人足球”“人体热量发电”“未来音乐工厂”等创新设计项目,大四开展为期3~6个月的出国研修和毕业论文训练。

## 项目运作机制创新

首先,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建立人才培养“特区”。在招生、培养、管理等环节,在注重“素质”的基础上,突出“拔尖”和“创新”的目标。

其次,设立专项经费,充分利用国家经费支持,同时积极争取社会资金参与。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聘任国内外高水平教师、资助学生国际交流和科研训练,以及奖学金、教学资源建设等。

第三,配备最好的学习条件,将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实验室、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向参与计划的学生开放,并为学生提供专门支持,入选的学生享受专项奖学金。

第四,开展拔尖人才培养规律研究,推动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组织教师、教育研究人员和教育管理人员就拔尖创新人才特质、培养途径及相应的体制机制等共同开展研究,推动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最后,重视国际化训练,建立长效海外高校联合培养机制。三年级学生100%赴海外一流高校交流学习一学期,每年选拔部分大四优秀学生前往美国知名大学以及知名机构进行科研实践。资助学生参加各领域内顶级国际会议。

## 经验与启示

新形势下,清华大学的“学堂计划”紧跟时代发展趋势,不断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其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第一,大师名家引领,培养方案不断迭代。通过设置专业人才培养首席专家,加强知名专家、顶尖学者对人才培养工作的深度参与。在制定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培养理念、课程方案和教学模式,由首席专家牵头项目教师组对人才培养方案开展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设计。同时,加强学术大师深入一线教学,依靠骨干教师开展精细化培养。加强学术大师在先导性课程、方法论课程、创新实践课程和挑战性课程的参与,让学生感受大师风范、树立人生榜样,在核心学术素养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得到一流教育。

不断优化与重构培养方案的同时,该计划通

过长期迭代形成精品课程和精品教材教案。深入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定期结合教学实践和学科发展情况,充分整合社会热点与领域前沿,动态调整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实现培养方案的持续更新迭代。

第二,学习兴趣导向,激发学生自主动力。注重学生学术兴趣和志向培养。通过先导性课程激发学生浓厚的学术兴趣,形成内生学习动力,让学生树立远大的学术理想,找到人生发展方向。促进学生形成自主学习能力。从始业期开始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习惯,教育引导掌握自主学习方法,使学生逐步掌握自主、可控、系统化的学习能力。同时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允许学生与指导老师共同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适当放宽专业和学制限制,扩大多学科学习资源的供给。

第三,注重核心素质,强化领袖精神培养。通过强化通识教育,做好非人文学科学生的思维能力、批判能力的基础性培育,塑造人文精神,拓展眼界胸怀。在加强学生培养过程中的文理渗透、多学科交叉,加强多领域学习的相互借鉴和促进作用,真正形成复合创新能力的同时,强化领导力培育,通过政治、历史等领域的学习实践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演讲辩论、社会活动、国际交流等方式激发和塑造学生的领袖精神。

第四,强化政策配套,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根据教学实践深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配套政策改革,在学分、学制、专业等方面设立改革试验田,提高学生学业发展的自由度、灵活性,制定跨院系、跨专业的学生流动机制,建设统一灵活的教学管理体系。

拓宽科研和教学资源的配置通道,增加对教学资源的投入,使有特长和有个性化的学生能获得充足的发展资源与空间。进一步推进学制改革与学分管理。探索宽基础的培养模式和较为自由的学生专业发展方向,简化较为死板的学分管理体系,激活学生选修自主性。

(作者系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党委副书记)